

应用目录学

简明教程

朱天俊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

朱天俊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朱天俊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 3017733-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80 千字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80091-441-0/G·598

定 价: 5.50元

编写人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艺

王锦贵

王燕均

朱天俊

陈光祚

张贤俭

罗友松

林仲湘

秦铁辉

葛永庆

前 言

目录学是致用之学，有着广泛的应用范围。中国传统目录学不仅有精辟理论的发挥，更重要的是它在读书、治学、考订、辨伪、类分古籍等方面，广为学者所利用；即使是理论阐述，也从不尚空谈，总是联系学术文化与文献整理，提炼出于实践有益的思想观点。近半个世纪以来，目录学在图书馆工作、图书编辑、出版、发行、宣传报导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取得显著的成就。考虑到课程间的联系，本书着重研究与总结古今整理与编纂文献的经验，并就提要、文摘、索引、书目、综述、书评编写的方法以及计算机在整理编纂文献工作中的运用，作了系统的论述与介绍，以力求适应大学图书馆学、文献学、情报学、编辑出版发行等专业教学的需要。通过集体努力，写成这部《应用目录学简明教程》。

本书由朱天俊主编。第一、三章、第六章第四节由朱天俊执笔；第二、八章、第六章第三、五节由王锦贵执笔；第四章、第五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一、二节由王艺执笔；第五章第三、五节由王燕均执笔；第五章第二节由林仲湘执笔；第五章第四节由葛永庆执笔；第五章第六节由罗友松、张贤

应用目录学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本书仅仅是教学人员与实际工作者结合所作的一次尝试。由于我们水平的限制，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同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朱天俊

一九九二年十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目录学的内容	(1)
第一节 目录学的起源与发展	(1)
第二节 目录学的内容与体系	(14)
第二章 目录学的特点	(20)
第一节 目录学的时代特点	(20)
第二节 目录学的民族特点	(23)
第三节 中国目录学传统	(24)
第三章 提要	(30)
第一节 提要的编写体例	(30)
第二节 提要的编写方法	(39)
第四章 文摘	(47)
第一节 文摘的作用与特性	(47)
第二节 文摘的类型及其内容	(51)
第三节 文摘的编写步骤	(56)
第五章 索引	(64)
第一节 语词及文句索引	(64)
第二节 类书索引	(79)
第三节 百科全书索引	(97)
第四节 年鉴索引	(105)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题索引	(111)
第六节 报刊索引	(120)
第六章 书目	(137)
第一节 国家书目	(137)
第二节 联合目录	(156)

第三节	地方文献书目	(168)
第四节	个人著译书目	(176)
第五节	选读书目	(190)
第七章	综述	(200)
第一节	综述及其作用	(200)
第二节	综述的结构与内容	(205)
第三节	综述的写法与程式	(208)
第八章	书评	(215)
第一节	书评的意义与类型	(216)
第二节	书评的写作方法	(220)
第九章	文献编纂中计算机的应用	(229)
第一节	计算机在文本编辑中的应用	(229)
第二节	计算机在书目编制中的应用	(231)
第三节	计算机在索引编制中的应用	(237)
第四节	计算机标引	(240)
第五节	计算机在编制摘要中的应用	(243)
第六节	电子版图书的编制	(246)

第一章 目录学的内容

第一节 目录学的起源与发展

一、目录学的起源

中国目录学起源很早，“《诗》、《书》之序，即其萌芽”。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诗》，即《诗经》。《诗序》一说为子夏所作，有大序、小序。大序序文与《诗经》首篇关雎小序合为一篇，似总论，说明诗的教化作用。小序分置各篇之首，说明各篇作者、本事及其作意，如《魏风·伐檀》小序：“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士尔。”

《书》，即《尚书》。《汉书·艺文志》：“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书序》文字极为简要，例如，《夏书·甘誓》序：“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诗》、《书》之序所以被看作为目录学萌芽，这是由于从中可看出《诗》、《书》之序，既含有揭示与记录文献之意，又具有揭示与记录文献的方法。

在古代，古人著书也常常写一篇自序，置于全书之后，以说明著书的目的，全书的纲要，并依其篇目次序，撰述每篇内容大要，其意与《书序》、《诗序》一脉相承，具有内在的共同点。现存最早的一篇是《吕氏春秋·序意》，这是公元前 239

年吕不韦编成此书后所写，原也放在全书末尾，后人置于十二纪之后、八览、六论之前。文虽残缺，间有错简，但从中仍可看出作者撰述十二纪的作意在于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为的是“纪治乱存亡也，知寿夭吉凶也。”认为只要天地人“三者咸当”，就可“无为而行”了。

现存最早完整保存下来的一篇著者自序是《淮南子·要略》。《淮南子》本名《淮南鸿烈》。西汉时淮南王刘安于公元前二世纪，招集宾客集体编写而成。现存内篇二十一卷。第21卷为《要略》。东汉高诱曾解释《要略》篇题：“凡鸿烈之书二十篇，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论其大体，故曰要略。”《要略》结构严密，既包括全书总序，阐述著书方法及二十篇缘由，也概述全书各篇要旨及内在联系；还历述古诸子的时代背景，说明学说产生的原因，诸子学说的兴起都是时代的产物。从而进一步阐述《淮南子》一书内容的完整全面。

《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古代另一篇有代表性的自序之作。该篇记述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的思想进行了分析。从《太史公自序》中也可见到司马迁撰著《史记》的目的和宗旨的略例和要点，以及《史记》130篇的内容概要。

《诗》、《书》之序以及古代著作作者自序，都是为了介绍一书各篇或一部著作的内容特点，为书目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中孕育着目录学的形成。

二、目录学的形成

汉高祖刘邦建立政权进入咸阳，萧何首先收藏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刘彻因见

“书缺简脱”，下诏“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记载：“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自元朔五年至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书积如丘山”，“天下遗文古书，靡不毕集”。成帝时，又命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由于当时图书是简书丝编，丝断则简乱。刘向等校书十九年，校书的方法是，广罗异本，比较异同，相互补充，除去重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校勘讹文脱简，命定书名等一系列典校图书的工序后写定正本，然后撰写叙录。叙录的内容包括著录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著者的生平、思想，说明著者原委，辨别书的真伪，评论思想或史实的是非，剖析学术源流，从而确定著作的价值。每篇叙录实际就是一书提要。此时，刘向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别录》20卷，即刘向等校书时所撰写叙录的汇编本。刘向卒，其子刘歆继承父业，他按刘向等校书的分工，作为分类的根据，以叙录为基础，编成《七略》七卷，开创了后世历代皇家整理藏书的规程式。《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与方技略。辑略是“六略之总最”，“诸书之总要”，这是大小类序文字的总汇。其它六略，即六大类。略下分种，共38种，种即小类。《七略》的分类是把前人学术分类的理论应用于文献分类的创始。在此之前，例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淮南子·要略》以及《史记·太史公自序》文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有着丰富的学术分类的理论与材料。东汉班固，在编纂《汉书》时，“因《七略》之辞”，“删其要以备篇籍”，编撰“艺文志”，以记西汉藏书之盛。由此开创了编纂正史艺文志的先例。

《七略》、《汉书·艺文志》的编成，说明刘向等总结了前人有关校书之序、著者自序以及学术分类的经验，在揭示与记录文献方面，已找到书目这种形式。如果说，扬仆编纂的《兵录》还是书目雏型，那么《七略》、《汉书·艺文志》已经是完整的书目了。范文澜指出，“《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我国目录学在它形成之初，就有如此引人注目的学术价值，说明它的传统源远流长，为世人称著。两汉时目录学的形成是与编纂书目分不开的。正是由于刘向、刘歆、班固等已经有着系统的编纂书目的理论知识，影响后世极深的书目《七略》、《汉书·艺文志》才有可能产生。在中国古代，编纂书目的理论与方法，就是那个历史时代的目录学。

三、目录学的发展

自汉代《七略》、《汉书·艺文志》以后，中国历代编纂了大量书目，类型多样：如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家藏书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地方著作目录、佛经目录等；又以多样名称命名，例如略、录、簿、目录、书录、书目、总目、解题等。作为研究书目的学问——目录之学，长期包含在校雠学之中。所谓校雠学，即今之文献学。由于古代书目，往往在文献校勘与整理的过程中形成。先作校勘，而后编书目，校勘又离不开版本，因此，校勘、版本、目录密不可分。在相当长的时期，无校雠之书，而有校雠之学；只有书目之书，而很少有以目录之学为名的专门著述。直至宋代，一些学者在文集、杂著和读书札记中，才常常提及书目。虽不提目录之学，

却阐发他们对目录学的见解；也有直接提出目录之学的，宋代苏象先记载他祖父苏颂的遗训和轶事，曾撰《苏魏公谭训》。书中写道：“祖父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根据这条记载，北宋已出现“目录之学”专门名词。

南宋郑樵编著了《通志·校雠略》。在这一著作中，他十分重视图书类例，认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不分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他提出书目提要“泛释无义”。他还主张书目要通录图书，“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这说明《通志·校雠略》已阐述了丰富的目录学内容了。

清代乾嘉时期，目录学一时成为显学。目录学为学术界所重视，目录学与学术研究的联系更为密切了。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开篇就论述目录学的重要。他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卷七中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他认为掌握史料当从目录学入手。目录学应用于读书治学，更为世人所注意。乾嘉学者广泛应用目录学于古籍整理，他们或注重考订经史，正订文字，选择善本，辨别伪书，辑佚文献；或通过文献分类、提要等，条别学术源流，反映学术兴衰。章学诚更以宗刘、补郑、正俗的著述宗旨，撰写了《校雠通义》，这是从郑樵《通志·校雠略》发展而成的一部著作，是对当时一些学者整理古籍工作经验的概括。他在《校雠通义》序言中写道：“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他讲学术源流，深得刘向父子校书精神。他在著作中，广征博引，联系书目

与文献，论述目录学的理论与方法。他认为分类应根据学术变迁及书籍内容变化情况而更改。他说：“七略流于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者也。”他提出互著、别裁之法。所谓“互著”，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必须“兼收并载”，要“不以重复为嫌”。所谓“别裁”，即“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他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凝聚了他的目录学思想精华，总结了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传统。

晚清耿文光撰写的《目录学》，这是一部名为目录学，实际是收录古籍50余部，指引初学者读书之用的提要书目。这也是一部视书目为目录学著作的典型著述。然而这却是向以目录学为学科名称的理论著作的过渡。

直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学者陆续编著出版了多种目录学著作。从理论到方法，从历史到现状都加以全面的论述。比较重要的著作有：

《目录学发微》，余嘉锡著。作者1932年至1948年在北京各大学讲授目录学时，曾以此为讲义。正式出版于1963年，由周祖谟据著者晚年增订本校正标点，中华书局出版。作者引用大量古籍资料，对目录学的意义、功用与源流，目录释名、历代目录类例沿革以及目录的体例，即篇目、叙录、小序、版本序跋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作者认为“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籍、自名赏鉴、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全书立论有据，资料翔实，理论历史融于一书，是一部比较系统而有影响的传统目录学著作。

《目录学概论》，刘纪泽著，初版于1931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34年再版，1979年台湾中华书局印行。全书

分目录学之起源、目录学之定义、目录学之体制、目录学之派别、目录学之功用、目录学在史学上的位置。体例严密，论述系统。

《目录学》，刘咸忻著，1934年刻印。作者认为“目录学古称校讎学，以部次书籍为职，而本书真伪及其名目篇卷，亦归考定，古之为此者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全书内容广泛，分上下两编：上编：著录、存佚、真伪、名目、篇卷、部类、别裁、互著、次第、解题；下编：版本、校勘、格式、文字、末论。本书实际是以目录学而不是以校讎学统括目录、版本、校勘三方面的知识。

《中国目录学大纲》，容肇祖著。写于1934年，油印本。作者认为“目录学的对象，简单地说，是书，详言之，则关于书的材料、书的形式、书的内容皆是。”以此观点，全面展开，分为导言、造成书籍的材料、书的内容、版本、分类及分类的历史、目录学家的著述。作者以书为目录学对象，实际是把书史、辨伪、版本、分类、提要、目录集于一书。他说的书的内容研究，是指记录书籍内容的沿革、方法、伪书考证、提要、书评、索引，重在揭示书籍内容方法的研究，虽涉及书的内容，但不是研究学术。书未公开出版，仅是作者在北京大学授课用的讲义。但本书完整地表述了一种学派对目录学的认识与见解，给人以启示，有一定的影响。

《目录学研究》，汪辟疆著。初版于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55年重印。本书是根据作者历年在中央大学授课用的讲稿整理而成，包括《目录与目录学》、《唐以前之目录》、《论唐宋元明四朝之目录》、《七略四部之开合异同》、《丛书之源流及其编索引法》、《汉魏六朝目录考略》。作者在本书序中写道：“本书论列，虽非目录学之全，然其索录略之渊

源，条分合之得失，与夫汉魏六朝间官私著录之钩稽，宋元明清后丛书类别之更定，所谓目录学之最繁难最重要者略已灿然备具。”指出了目录学之精要。尤其书中详述丛书的源流及类别，为同性质书所未记述的，有独到见解。

《目录学》与《中国目录学史》，姚名达著。《目录学》初稿于1929年，“一二·八”之战，毁于上海宝山路寓所。1933年重写，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在自序中说：“这是专门研究目录学的著作，给一般图书馆的馆员和读者做一只开门的钥匙用的。”全书分原理、历史、方法三篇二十章，全面论述了目录学。范围广泛，古今目录学知识无所不包，图书馆编目知识已有所涉及。

《中国目录学史》是《目录学》历史篇的扩大与补充。写于1935年至1937年间。初版于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57年重印时，附王重民《后记》。除对原书文字、标点做了订正，并以新的材料，就若干问题，作了补充说明。姚名达认为中国目录学史中“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因此全书不以时代为序，而是分叙论、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结论诸篇，“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比较详细地概述了自古代至抗战前中国目录学的发展。书中融合了西方图书馆编目理论与方法知识，图书馆目录的著录、分类无所不论。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之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分类未能以学术分类为基础，不能反映图书内容的本质。他指出，优于西方目录学者唯解题一宗。他批评现代目录学效法西方之法，古之弊未去，古之解题之优点则全丧失。他提倡主题目录，反对十进分类，主张精撰解题，不赞成详列篇目。他希望统一分类，标题编目，使治书之业，寻书之法，

易学易做，目录学成为人人所共知的最通俗的常识。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还专门论述了类书与目录学。他赞叹类书分类细密，“创意之早，收书之富，实足夸耀世界。”他指出，“类书的分类，亟宜研究之，改良之，使与主题目录相应，与分类目录相助，则目录学之范围予以扩张，则其功用更加显著矣！”

总之，姚名达所著《中国目录学史》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成为同时代人总结中国传统目录学最好的著作之一。而他本人在目录学研究中，既抓住了中国传统目录学之精髓，又及时吸收了西方编目理论，成为综合讲述中西目录学的先行者。

姚名达还从《中国目录学史》原稿“通纪篇”，编纂成《中国目录学年表》。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上起秦代，下迄民国，从千百书中钩稽而出，以时间为序，考订排比目录学史事，以补《中国目录学史》按专题分写之不足。从书中可见数千年来图籍文化之盛衰，书目之发展，中国目录学之源流。

《校讎目录学纂要》，蒋伯潜著。本书是作者在1941年应朱自清先生之邀，拟赴西南联大任教前所写的讲义。后因交通阻塞，未能成行，1944年将书稿交正中书局出版。新印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5月出版。作者认为校讎学有广义、狭义之分。清代中叶，目录学才从广义校讎学中分化出来。校讎学、目录学既然关系密切，又颇多交叉，因此作者把二者结合起来著成此书。

全书分绪论、上下编及附录。上编为校讎编目学底历史；下编为校讎目录学底内容，包括征求书本、校正文字、厘定篇章、撰述叙录、鉴别伪书、佚辑蒐文以及分类、编目等。

书中提出，研究学术源流派别，是学术史的任务，但研